

办学也得尚俭戒奢

□ 王瑾

贯原则。无论是在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还是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都面临教育经费短缺与教育事业之间的矛盾。解决这一对矛盾，是随着局势的发展及经济状况的改善而逐步缓解。抗日战争时期，我党我军为培育干部，在延安简陋就简办起了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简称抗大)，那时的教学条件与国统区的大学、中学无法比拟，但抗大却吸引了大批有志求学的进步青年。新中国成立后，中国教育事业随着国家建设的加快而得到提升，但仍然坚持的是勤俭办学的原则，因为作为发展中国家，我国教育经费短缺与教育事业之间的矛盾，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

一个地方，办什么样的学校，建什么样的校园，要量财而行。建学校不看条件，贪大求洋，只能吞食举债度日的苦果。试想，一个刚摘脱贫帽的县，2019年全县的财政收入不足两个亿，即使倾全县财政收入补建校舍，也要逾三年。假设该县财政收入都用于还

债，无钱用于改善民生，什么事都干不成了，该县岂不又坠入深度贫困县？当然，也许笔者有点杞人忧天，该县也许有其他融资渠道，但如果有其他融资渠道，拿出一部分实实在在地为老百姓奔小康干些实事，不是更需要、更惠及民生吗？

当然，出人才与学校教学条件不无关系，但不是绝对的关系。大凡优质的学校，不只是优在硬件设施，而是优在师资，优在教学质量。比如，以教学质量雄居全国中学之冠的湖北黄冈中学(通称黄高)，它的校园设施并非全国之冠，总建筑面积还不及镇安县中学，却在“严谨、求实、团结、奋进”的校训下，每年向全国高等院校输送了大批一流人才，多年高考一直保持98%以上的升学率和75%左右的重点大学录取率。该校的成功真谛，我以为就在于多年积累了一流的教学经验，拥有一流的师资队伍。

教育开民智，教育启动科技之门。

古往今来，中国圣贤多重视教育。但重教育并非建一流的设施就是重视，而应重在给学生教了什么，学生接受了什么？镇安县举债仿唐式豪华校园，有些设施与教学似乎关系不大，比如气派的仿古牌坊式大门、16尊石刻鲤鱼、8米长的校训大理石、多层喷水池及水车、栈道、石桥拱桥……

法国哲学家阿尔贝·加缪说过：“只要我能拥抱世界，那拥抱得笨拙又有什么关系。”此话很有道理。在条件有限时，非华丽地而是笨拙地拥抱你眼前的世界，又有什么关系。诚然，教育优先并没有错，但应优先在教与学；为学生营造良好学习环境也没有错，但学校环境的营造，要从实际出发，从实用出发，从尚俭戒奢出发。只要有拥抱教育之心，建校俭朴点，有什么关系！

(作者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人民日报高级记者，人民日报海外版原副总编辑)



作者同尹传红(右)在重庆朝天门对岸晤谈

6月初，《科普时报》原总编辑尹传红由中央组织部选派，到重庆垫江县挂职去了。我既为他高兴，又有些不舍，心里时常念叨着他，窃以为他心里也装着我这老头儿吧。可不是么？前时从朋友圈里获悉我正在重庆出差，他就发信说，要来看看我这个老朋友兼《科普时报》“老资格的专栏作者”。

周日那天中午，他坐高铁从垫江抵达重庆市区后，乘地铁转公交到了我的住处附近。随即，找家小铺吃了一碗重庆小面当午餐，又在一家书店里泡了两个小时，下午3点过后方才进我的家门。听他说，如此安排只是“怕耽误老人家的午睡”，我一愣，直感慨：真真君子之风也！

说话时传红依然背着个双肩包——那是他出行惯常的标配，里边通常装着些他随时会拿出来作宣传的《科普时报》。这场景，我们京城里经常开会碰面的朋友们都十分熟悉，对他的敬业精神赞誉有加。业已从政的他这次在重庆“亮相”，会当如何呢？这怎么寻思着，我的视线也跟他放下背包，拉开拉链，呵呵，他果真又拿出了《科普时报》！我不禁哈哈大笑，真是服了这“报虫”了。他倒有些难为情了，对我说：“习惯了，顺便的。”这其实是刚刚收到的北京老同事寄来的样报，内中有对垫江首届龙舟赛与尚莲文化节报道，出门时他顺手就抄上几份带给我看。

寒暄几句后，我领传红到房间外的阳台上入座。放眼所见，对岸朝天门码头下，长江与嘉陵江两江汇合处波涛汹涌、气势恢弘。我俩就在这样的氛围里聊开了去。

虽说我的岁数要比传红大两轮，但我们却一直以“兄弟”相称——我唤他“传红兄”，他则借用我在科普圈里的绰号“老顽童”，叫我“顽童兄”。讲真，我俩确是一对没有代沟的“忘年交”。我们结缘于科普，更在《科普时报》这个事业平台上增进了合作、升华了友情。

走笔至此，忽然想起我与传红合作的一桩趣事。20多年前，我在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任职，传红则活跃于《科技日报》。那年春天，中央电视台要做一档有关达尔文进化论的专题节目，邀请我搭框架、写剧本，而我被定为特邀嘉宾之一。行将录制节目时，审阅过台词脚本的制片人发现，传红对科学史的熟悉程度几近专研这门学科的学者，便临时改变主意，让刚而立之年的他上嘉宾，跟我一起对谈。那一阵我忙得很，只是上镜前夜才抽出时间看了一遍台本。节目正式录制时，我侃侃而谈“人戏”太深，不时抢话，并且多次把本该传红的台词也抢了，弄得他屡屡卡壳暗暗叫苦。不过，下场子时他只是对我说了句：“您记忆力真好，小的佩服！”

后来，我们合作的机会多了，又数次一起出镜。偶尔地，我故伎重演，传红依旧不以为意，一笑了之。自然，这当年的毛头小伙已经成熟起来，能够应对自如喽。

3年前，科技日报社领导慧眼识珠，大胆启用传红出任全国独一份的综合性科普类周报《科普时报》总编辑。创刊之初他与尹宏群就确立了“让专家做科普”的目标，并通过设置各种特色专栏，发掘、集合了大量的科普资源，在报纸上展现了多姿多彩的科学文化之光。

我的“余生趣谭”专栏，从定位、内涵到栏目名称、栏标设计，初时都跟传红和版面编辑于翔进行过反复磋商，从而让我的创作意图和思想能够得到有效阐发。它有幸与苏青的“青诗白话”、李大光的“摇曳烛光”、程桦的“萍踪语”、刘晓军的“竹园茶话”、郭耕的“笔耕自然”、金雷的“冰原手记”，以及传红本人的“科学随想”等专栏，作为最早的一批特色栏目得以在《科普时报》上呈现，并延续至今。这些富于科学人文内涵的栏目文章，有滋有味，风格迥异，它们以亲切自然的笔触向读者介绍百科知识、传递创新意识、弘扬科学精神，被传红视作报纸盛衰的“当家菜”，据说一直颇受读者青睐。

就我所闻，数十个特色专栏荟萃一报，是极为罕见的。这是《科普时报》的特殊创意、别样壮举。“二尹”带领大家奋力拼搏，开辟了一个科普的新天地。所以不奇怪，这份报纸甫一面世即在科普界赢得良好口碑，大量文章被“学习强国”转发，创办仅一年即荣获中国科技新闻学会颁发的“2018年科技传播奖”优秀团体奖(是获奖的唯一纸媒机构)。而集编者、作者和策划者于一身的尹传红也不负众望，当之无愧地被中国科协及人民日报授予2017年度全国“十大科学传播人物”荣誉称号。

3年走来，殊为不易。我参与，我见证，我抒怀！尤其是读到传红离开北京前发布的“告别辞”，甚感欣慰、温暖。他特别提及：

“在依依惜别的几天里，我一直跟编辑部同仁念叨，要特别感谢、善待我们的专栏作者，他(她)们是《科普时报》的重要支撑和品质保证。如今的30多个特色专栏，将会继续延续下去。我们也要特别感谢其他给《科普时报》赐稿、赐图和接受我们记者采访的专家、学者和网友，他们的精彩呈现也大大地丰富了我们报纸的内容。”

如此这番，将我眼中的报人报事道出一二，是已向即将迎来3岁生日的《科普时报》致敬！亦表达一个专栏作者老顽童由衷的感激之情。

(作者系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会委员，中国科技馆原馆长、研究员)

余生趣谭

眼中窥报
(怀国篆刻)

康养文化与芳疗香道

□ 刘为民



错金博山炉

“薰香”；开口奏事，还要在嘴里含上“鸡舌香”。同时期出现了“薰笼”和“熏球”——两个半球形的镂空金属片扣在一起，中悬一个杯形容器焚香，即使摇晃晃香也不会倾洒，又称作床上的“被中香炉”。

伴随着唐王朝的空前富强，尤其是国内外贸易的繁荣，货运来的西域香料源源不断。南方“海上丝绸之路”使得大批香料经两广、闽浙北上，出现了专门

经营香材香料的商家、专家和医药师；对香道的研究和利用，包括产地、性能、炮制、作用、配伍等，也开始进入专门化、系统化阶段；还设立了专职人员负责香道事务。唐代香具出现大量金器、银器、玉器，这在敦煌壁画里都有具体细致的表现。甚至制作点心、茶汤、墨锭、纸张等，时常也会调入香料、香材。

宋代之后，香道开始融入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贵妇出行，常有丫鬟持香薰球陪伴伺候；文人雅士不仅用香，还亲手制香，并赋词写诗，鉴赏品评，如李清照名句：“薄雾浓云愁永昼，瑞脑消金兽”(《醉花阴》)；笔记先写“熏香”及所用器具。香型方面，除了香丸、香饼、线香等，还广泛使用“印香”也称“篆香”，即先调配好香粉，再用模具压成回环往复的图案或文字，不仅增添情趣，还往往用作计时工具。

元代“藏香”礼仪开始影响中原大地；到明代香道文化已经相当成熟。李时珍《本草纲目》记载：“乳香、安息香、樟木并烧烟薰之，可治卒厥”“沉香、蜜香、檀香、降真香、苏合香、安息香、樟脑、皂荚等并烧”“可辟瘟疫”等等。难能可贵的是，李时珍还考察记载了制作“线香”的工艺技术：“加入榆皮面作糊和剂”“按压”“成条如线”等。现当代的精油芳香疗法是欧美和东亚日韩的舶来(化工)品，我们推荐、培育民族传承中草药的“香道”——是屠呦呦获取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带给我们的启示，让我们坚定了绿水青山也是“药山宝山”的科学信念。总之，“科”字当头，“普”惠民生，开发香道，服务大众——应该是我们建设康养文化的一个重要思路。

(作者系北京大学文学博士，南京大学博士后)

文坛赛先生

第四届宇宙漫游创作大赛落幕

第四届宇宙漫游创作大赛颁奖典礼8月20日晚在广东实验中学体育馆和云端同时进行。线上线下的大批观众共同见证了国内天文学领域最大规模和最高规格的视觉盛宴。

为响应全民科学素质提升行动计划纲要号召，中国天文学会、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联合发起了万维望远镜宇宙漫游创作大赛，旨在通过万维望远镜宇宙漫游的设计、制作激发参赛者的科学兴趣，提高科技创新和实践能力，培养团队合作精神。

本届大赛于2019年10月底启动，2020年6月30日截止提交参赛作品。大赛共收到130余部漫游作品，形式审核后有效作品121部。277名参赛选手，47名指导教师，近40所院校单位参与了本次大

赛的宇宙漫游创作。无论是参与人数、作品数量，还是作品水准，都创造了历史新高。经过层层评审，最终《无尽的前沿》《东方红》《星链》等34部作品分别荣获一二三等奖，《西游记》等6部作品获得了最佳创意、最佳视觉、最具艺术性作品、最佳科学传播、最佳课件等单项奖。本届大赛最佳球幕奖空缺。

华中师范大学等9个单位获得优秀组织奖。13名大、中、小学的教师获得优秀指导教师奖。

中国自然科学博物馆协会名誉理事长、国际博物馆协会李象益先生通过视频连线的方式在颁奖典礼上宣布了大赛单项获奖名单，并寄语青少年要充分利用万维望远镜这样的先进工具和理念，养成主

动学习的习惯，提高自主创新的能力。

优秀指导教师奖获得者、华中师范大学俞云伟教授说：“万维望远镜建立起了一个具有空间和时间维度的虚拟宇宙，使普通人也能够身临其境、漫游其中，是对天文科普和教育工作的一项重大创新和探索实践”。

万维望远镜借助先进的数据可视化技术将这个数字宇宙呈现给用户，被誉为是虚拟天文台的“大众版”。其独特的漫游设计和展现功能，让普通公众和中小學生都能在专业天文数据打造的数字宇宙中创作自己的星空故事，通过屏幕、弧幕、环幕、球幕、虚拟现实等多种方式与他人分享。

天文学是一门古老而常新的基于观测的科学。如今，天文学成为一门大数据和

数据驱动的科学。“中国天眼”FAST、郭守敬望远镜LAMOST、以及在太空持续运行30多年的哈勃空间望远镜等等，这些国内、国外的天文观测利器为人类收集了海量的天文数据。建设和规划中的新一代观测设施和探测器更将为我们带来巨量的数据和宇宙更深的洞察。借助先进的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技术，把全球的天文数据互相联结起来，构成一个信息量无比丰富的“数字宇宙”，任何人在任何地方通过任何方式都可以访问，这就是“虚拟天文台”。以国家天文台为首的中国天文界2002年提出“中国虚拟天文台”计划。虚拟天文台的这个数字宇宙为科学发现、天文科普教育、人工智能、计算机科学都提供了无限可能。

生在一个有科学素养的群体中有多重要(下)

专家访谈

问：哪些群体的科学素养的提升最应该受到关注？

裴新宁：全民科学素质提升反映国家经济实力的强大和人民生活的安康。青少年是建设科技强国的后备军，科技创新需要建立在坚实的科学素养基石之上。几次国际科学能力测试表明，我国青少年的基础性科学知识掌握得较好，但这还不能说明他们更知道如何做科学、更懂得科学究竟是什么。近期国际测评数据和国内相关数据均显示，我国青少年对现代科学观和现代科学方法缺乏足够的了解，科学兴趣、科学精神以及对相关职业的期待体现不足，分析和解决复杂问题的能力不占优势，这种状况持续下去会严重阻碍创新力的生长。本书呈现的大量研究表明，在校学习资源、非正式科学教育资源都是影响

学生科学素养发展、导致群体间差异的重要原因。希望全社会更加关心孩子们的科学素养发展，加强中小学科学教育资源(包括课程)的建设，让中国的科学学习网络富有活力、为孩子们培育肥沃的科学土壤，让他们从小受到充分的科学精神和科学熏陶。

问：当前教育系统比平时更加依赖于互联网，这会不会加剧科学素养获取时的机会差异？

裴新宁：如果我们不注意利用互联网的优势做好科学普及，比如建设高质量的科学学习网络和专家支持网络，可能会失去当下时代所赋予的科学素养发展机遇。我们要做的不是按照线下模式制作线上课程，满足于对传统教育结构和传播方式的继承，而是要认真研究人的学习机制，识别不同群体学习者的在线学习特征，研究如何利用互联网和智能技术加强我们的文化支持，利用多样化的内容、工具和途径等使得学习更有效。

问：科学素养对我们国家的科学教育与传播有什么启发？

裴新宁：第一，加强对科学素养发展机制的研究。我们要树立全面立体的科学素养观，重新审视我国关于不同群体科学素养的观点和实践。特别是要反思中小学课程中对科学素养内涵的界定，摒弃对科学素养定义的断章取义，着力研究和揭示中国文化背景下儿童青少年科学素养发展的因素和路径。科学素养的发生与发展机制不清楚的话，测评和发展工作会事倍功半。第二，加强科学传播工作的专业性。一方面确保内容的正确性、适当性和丰富性，另一方面注意吸引受众参与，激发和引导对话、论辩、发现和质疑。科学传播者需要经过专门能力训练。第三，加强优质科学教育资源建设。这一点国家需要做好统筹。科学家即科学传播者的信念由来已久，需要为我国科学家提供更适当、更

有效的参与科学传播和科学教育的机会和合法性保障。

问：您翻译这本书最大的难点是什么？

裴新宁：学术翻译更多地是为读者而作，但又必须站在作者(源语言)的立场。原著是研究者写给同领域研究者的，是可以代表美国科技界最高水平的科学研究报告，文字精准，大量的研究背景和研究成果的表述更是简约和技术化。在我国，科学素养日益得到重视，但研究者还是少数，中小学科学教育、大学的科学素养课程等，更多是对科学素养领域一些结论的使用。这两种语境是不同的。不断地在两种语境之间切换并保持“不掉线”(良好的对接)，是本次翻译遇到的最大挑战。翻译时需要对照原著中一言带过的单个研究和数据进行原始文献考证，并注意中文表述的直白、准确。做到既不损失学术之严谨，又要流畅和通俗，时常举步维艰。有的表达虽已修改无数次，也依然不尽满意。